

故事叙述与人物塑造

段崇轩

当下短篇小说最薄弱的环节在哪里？在人物塑造。在当下的短篇小说中，生活淹没人物，故事取代人物，叙述遮蔽人物，已成为普遍现象。关于人物与生活、故事的关系，钱谷融先生说：“人和人的生活，本来是无法加以割裂的，但是，这中间有主从之分。人是生活的主人，是社会现实的主人，抓住了人，也就抓住了生活、抓住了社会现实。反过来，你假如把反映社会现实、揭示生活本质，作为你创作的目标，那么你不但写不出真正的人来，所反映的现实也将是零碎的、不完整的；而所谓生活本质，也很难揭示出来了。”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生活、现实的本质关系，阐明了文学创作必须以人为中心，用人带动生活，显示生活、现实的创作观念。现代短篇小说严苛的艺术规则之一，就是要求在极有限的时空中，努力写出人物来，生活、事件、叙事要围绕人物展开。短篇小说强调写出人物形象，但并不苛求只写那种现实主义的个人化人物，乃至个性与共性高度融合的典型人物。意象型、类型型、象征型、现代型等人物，同样可以写得很成功。短篇小说更期待写出那种面目一新、戛戛独造的人物形象。在2021年的短篇小说中，就看到一个这样的形象。张者《归途》中的叶一杰，出生在一个富有的、著名的企业家家庭里。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见多识广、自由生长。他喜欢打扮自己，尤爱奇装异服，热衷田径长跑，倾心戏剧。后来又爱上造型摄影，迷恋服装设计，就读美国设计学院，异想从事音乐，爱上华裔法国姑娘。他的前途无限广阔，但最终却决心回到中国。这是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历史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形象，他偏执、多变、任性，他聪慧、爱美、进取，既有纨绔子弟的浮躁、奢靡，又有开拓者二代的洒脱、抱负。他的性格、精神中，有一种当下时代的开放性、世界性特征。尽管他还是一个成长中的形象，但身上确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素质和精神。宋尾的《熏鱼》，意在写出一个独特的城市文化人——曾乙的悲剧形象。他出身于城市文化家庭，长得英俊儒雅，热爱文学与美食，且多才多艺。但他的命运却一路坎坷，干一行倒一行，不惑之年自杀而亡。既往小说中大多写农村人的进城、奋斗，成功或失败，而对城市文化人却关注不够、描写不多。曾乙这一人物，无疑是作家的一个发现、创造。但由于作品过多纠缠在人物的经历、人与人的关系等方面，故事淹没了人物，叙述偏离了人物，使这个有价值的人物形象，难以坚实而生动地站立起来。努力写出人物的历史背景，抓住人物性格转变、迸发的一瞬间，突显人物的个性精神，是短篇小说塑造人物的一种独特方法。一些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，都偏爱这种方法。铁凝的《信使》，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史背景上，刻画了二位大学“闺蜜”陆婧与李花开的形象，还有李花开丈夫起子的形象。中心事件是起子妄图利用传递爱情信件的机会，达到个人调动工作的目的。陆婧是一个城市女子，当她面对起子无耻的要挟，她在悲痛无助中，提起一壶水倒入燃烧的炉膛，表现出一种刚烈的抗争精神和不容玷污的人格。李花开虽然生在农村，但同样是非单纯刚强的，她得知丈夫是个无耻小时，以跳房自杀的方式迫使丈夫离婚。两个年轻女子的纯真、刚强性格迸发出耀眼的光辉。与铁凝一样，同是“50后”作家的唐颖，擅长塑造上世纪成长在80年代的女性形象。如《咖喱妹妹》中的咖喱妹妹，本是一个内科医生，但思想开放，在爱情上追求自由，在出国热潮中，借婚爱条件移民国外，但在婚姻与工作上却遭受了一连串挫折；如《树在树中老去》里的上海女子，有画画的天分，向往所谓的自由、先进，嫁给国外开餐馆的先生，却落入了另一种不自由。两位女性形象，都表现了上世纪80年代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女性的开放、叛逆性格，以及天真想象和在现实中的屡屡碰壁。这两位作家经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，写的又是她们熟悉的人物，因此人物就显得逼真、结实而丰满。捕捉历史风云中有艺术价值的人物形象，发掘他们身上那种恒定不变的性格精神特征，也是当下一些短篇小说的选材之道。斯继东的《传灯》，以孙子“我”为叙述人物，刻画了一位绍兴城书法家徐生翁的形象。祖父出身贫寒，自学成才，不谙世俗，潜心书法，效法自然，晚年变法，终成书法大家。他的坚守艺术、贫贱不移、孤高自赏的性格与人格，是老一代文人身上最可宝贵的品格。聚焦特殊环境，彰显人物性格，也是短篇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得力方法。朱山坡在塑造人物上已形成了自己的路子。《永别了，玛尼娜》用对比的手法，刻画了两位性格鲜明的人物。“我”被派到卢旺达做援非医生，玛尼娜是当地的黑人护士。“我”的懦弱、中庸、瞻前顾后，与玛尼娜的纯真、爽快、野性、多情，形成强烈对比。《萨赫勒荒原》同样写的是中国医疗队援非的故事，在贫穷、疾病、蛮荒的特殊环境中，青年司机萨哈的忠于职守、舍己为人、乐观坚定；萨哈老母亲对中国医生的感恩戴德，视为亲人、拳拳母爱，都表现得感人肺腑。也许置身逆境、绝境的人们，才能激发出如此动人的真善美人情、人性吧？在这些人物身上，蕴含着作家对现实的洞悉、反思。

③

本版图片来源：百度

“破体”和文体创新

吴俊

所谓“破体”，简单是指行书的变体，最早是指王献之在父亲王羲之的书体规范基础上，新创书体，自成一格。破体之说后来沿用、引申到了其他领域，各体艺术的流变创新都有破体之功。

文学破体的优劣成败恐怕更容易辨析和理解。古代以来，诗词曲赋小说种种，无不渐进而成，其中多少都有破体制制的加持助力，或因破体而终于大功告成，并成固定的规范文体。只说近现代吧，草创期的新诗兼有了传统长短句和新体自由诗的文体特点；较熟知的鲁迅散文诗则是典型的破体新创文体，融汇了新诗和现代散文的体式。到了当代、新时期，文学的破体新创仍是一般现象，并不少见，而且，越来越体现出当代文学的发展进步活力。

破体已经成为现今常态。如果对写作者角色来分析的话，也有“破体作家”的渐趋流行之势。也就是，有的写作者是以破体写作为主要方式，并获得了相当的成功。

我之谓破体写作者的含义，引申而言，大致包括了这样几种情况：

首先，是指批评家、学者而兼有文学体裁和文学文体的创作。比如学者教授偶尔“出圈”兼作小说或散文或诗歌，也有学术与创作一向并重，但主要仍是学者的身份。这类创作显然会在诸多方面有别于通常所说的职业作家创作，其破体之义既是将文学创作的感性审美注进学术理性的肌理，丰富学者精神人格的滋润涵养，同时也为文学创作带来别样风情，并产生批评研究与创作实践的互动沟通。对文学批评的通达达理、以意逆志，尤为有益。

其次，主要是指学者学术文体本身的“破体写作”，或作家在研究著述上的学术性创制——显然有别于通常学院教授的规范性学术文体的撰写方式。老辈如王蒙的《红楼梦》研究，中年者格非以小说家而有治《金瓶梅》专著，王家新以诗人而同是翻译名家，年轻者也不在少数。前者即学者的破体写作中，孙郁教授的学术文体往往兼有美文个性的润泽，随性自如，亲切率真，真可用作治疗刻板学院文章之弊的良药。毛尖教授则直把性

天龙救援 天下已任

——长篇报告文学《天龙救援》序

张石山



奔跑中的天龙救援队

在山西，特别是在省城太原，好多人都听说过名声响亮的天龙救援队。然而好多人对这支队伍的了解，只是一鳞半爪。相对于天龙救援队历年来为社会公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，人们对于这支队伍的了解与评价，确实远远不够。

天龙救援队，是一支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救援队伍，纯粹由来自民间的不同行业、不同身份的众多志愿者组成。这支救援队伍，不要任何报酬，所有的救援装备全部由自己购买，他们参与公益活动所需的种种保障全部由自己承担费用。当有地方发生了地震、洪水、龙卷风等自然灾害，或是发生了人员走失、坠崖、溺水等危急情况，这支救援队伍都会闻风而动，奋勇冲上第一线，救人于危急险难之中。

除了救援抢险，他们还经常出现在社区街道、工厂校园、车站机场等许多地方，参与众多彰显人间大爱、有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公益活动。

天龙救援队，自愿组合起来的这样一群人，他们的行为，共同弘扬了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，彰显了一种崇高的公民美德，继承发扬了华夏文明中最为宝贵的仁道传统。

《论语·泰伯》篇第七章，曾子曰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

情文字投胎托体成了学术批评，她的文章既是议论散文，又是义理批评，说是学术学理，却又处处杂文笔法。一篇文章而有多副面孔，只有洞察练达、鞭辟入里显出本相颜色。无怪能够妥妥吸粉无数。

再次，是表面上几乎看不出所宗文体，无法归类而成极端案例，实质却最是自由而圆融的一种文章文体的写作。这种写作将学术文章、文学批评、散文随笔、演讲谈话、序跋书评等融汇一体。看似随性而谈，信笔写来，无有任何规矩可言，实则四面八方、中外古今都在照应，人生书本、个人社会都有关心。文体形散而精神俨然，行文不羁却自有中心，尤见心思关切的温暖性情满溢纸面。驾驭文字之力可谓笔到心到而意在言外。有人说这是回归到古代文章的体式 and 境界，不再局限于西风东渐至今的文学分体规矩了，说的也是有一定道理。不过也许与文章作者的抱负胸怀有关，并不一定主要关乎文学文体和写作的技术。

一据说在传统的古代文学论域中，文章体式关联文脉绪绪的承传，且与文化观念、意识形态有着内在关联。简言之，文体关乎世界观和思想立场。即文章文体的形式并不独立于观念意识之外。在现代文学概念里，破除了传统意识藩篱之后，文体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有了别样的深意。最重要的是，写作与人生的具体实践形成一种同构关系，个人与社会在写作行为里产生共同的交集。写作方式不再主要限于书斋里的个人天地，而是深广地关乎现实的人类状况和社会生活。在此意义上，文体之变就是在文学领域里发生的写作者的情感之变、认知之变、思想之变、世界观之变。写作技术具有了广义的人生、社会和世界视野。回头再看表面上矛盾对立的尊体、破体(或谓变体)关系，实为相互交织的共同体，而且终归于创新一体。这是将文体实践的意义提升到辨体观念的更高层，而其价值的广度实现，就在文学的丰富写作生态中。

换言之，传统的“破体”贯穿着当代文体创新的实践和理论，内含着写作者文学无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。归根到底，这也是一种“人的文学”——新时代中国文学的文体生态面貌。

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质言之，曾子所倡导的“仁以为己任”，正是以天下为己任。怎样做才叫天下己任？如何才算是继承护卫我们的传统文明？天龙救援队的所作所为，给全社会作出了一个极好的榜样。

天龙救援队，这样的一群人，不妨说是一群甘于奉献、还报社会的人，是一群崇尚美德、富于爱心的人，是一些秉持践行传统道德的人。甚至可以说，他们正是一群以天下为己任的当代士君子。

天龙救援队的种种可观的业绩，救援活动中的种种惊心动魄、感人至深的故事，人们对其知之甚少。他们不计名利、无私奉献，可得益于这种奉献的人们，绝不应该将其视为理所当然。对其进行介绍、宣传、歌赞，让全社会更多地了解他们，非常必要。

《天龙救援》这本书，可以说是应运而生。

我读到这部书的初稿，是在2021年的年初。其时，我们的邻省河北，突然暴发了新冠疫情。天龙救援队，闻风而动，即刻迎难而上，在第一时间奔赴疫区，奋不顾身投入防疫消杀行动。这样的行动，确实让人敬佩！

在出版社编辑审定《天龙救援》一书的过程中，又有盛夏河南水灾、深秋山西水灾发生。我们的天龙救援队，又是即刻出动、迎难而上，冲在抗灾抢险的救援前线。

本书作者武玉山先生，及时跟进，将天龙救援队的几桩典型事例写成文字，充实到了这部书稿之中。于是，这本书，比较全面地写出了山西天龙救援队成立十年来的诸多光辉业绩。同时，这也是全国首部反映民间救援队伍真实状况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。

武玉山先生供职于国家电网太原供电公司。其人热爱公益事业，本身就是天龙救援队的队员，而且，他喜好文学创作有年，曾经出版过散文集《玉见山水》，还曾经担任过重点讲述援藏故事的报告文学集《我在高原》一书的主编。所谓“入乎其内，而有生趣；出乎其外，而有高致”，我希望，同时也愿意相信，武玉山先生创作的这本书，将能取得预期的成功，产生广泛、普遍、深刻、积极的社会影响。

勇哉天龙救援，仁哉天下己任！

“非虚构”不应背离真实与审美

陈剑晖

“非虚构写作”是一个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散文潮流。介入现实，强调在场，直面社会问题的“危机叙事”，是整个“非虚构写作”的主流。潜入历史的细部和记忆的深处，通过史料的发掘、梳理、辨析、整合和重新发现，重新思考某些重要的人物与事件，揭示以往被遮蔽的某些真相，是近年“非虚构写作”一个重要的创作趋向。

“非虚构写作”也引来了热议。有人认为它不过是美国“非新闻小说”的翻版；有人则从谱系学的角度，认为应厘清“非虚构写作”与传记文学、报告文学及新闻报道的关系，等等。这些都有必要，都有道理，但笔者认为，当前更迫切的是要提高“真实性”的纯度。有一些打着“非虚构写作”旗号的作品，包括一些名家的此类写作，明显违背了“真实”的原则。如阿来的《瞻对》，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，而且，阿来引用皇帝的批文时，喜欢穿插进诸如“皇帝很生气”“皇帝不高兴”“皇帝想”之类的心理描写。事实上都是作者根据文献史料推测出来的。这样，读者就有理由质问：皇帝是这样想、这样讲的吗？这样写有什么依据？又有多少真实性？当然，也许有人认为，《瞻对》这样处理文献史料是为了使作品有一种“厚重”之感，挖掘出隐藏于现实深处的历史情结。但笔者的理解是：厚重不应是繁琐文献的堆砌，厚重应是精具人文素质的读者都能看懂，厚重更不应与真实相背

离，否则“非虚构写作”有可能因其真实性的欠缺而遭到读者的抛弃。

还有是审美性问题。一些读者和评论家之所以对“非虚构写作”有抵触，皆因一些“非虚构”作品只是用新闻笔调罗列记录生活现象和事件，缺乏散文文体应有的优雅、修辞、文气、情采、格调、氛围与韵味，这样也就削弱了“非虚构写作”的审美效果。举例说，梁鸿的《中国在梁庄》系列作品，从散文的文学性、审美性角度来审视，它的理性思维压倒审美思维；尽管它侧重于生活的实录，且有大量“原生态”场景的呈现，不过它的叙述过于平铺直叙，语言也不够优美，缺少一点言外之意、画外之音。如果在审美上多下功夫，再适当增加一点文学想象，这部广获好评的作品将更精彩。

“非虚构写作”要提高自己的品格、质地和可读性，还要尽量写出人性的深度并具备一定的批判精神。苏联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“非虚构写作”，既是一种社会性的写作，也是一种精神性的写作。她带着尖锐的问题意识，抱着对文学的虔诚和对真理的热爱，不但让读者看到了生活的真相，同时还深度写出了战争中人性的善与恶，批判了制造灾难、与真理为敌以及一切违反人性的行径。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经验，值得中国“非虚构写作”的作家借镜。



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特别的春天。3月以来，各地面临着疫情防控的巨大考验，原本热闹喧哗的城市，按下了暂停键。步伐虽然相对静止，但文学与阅读从未止息。来自作家、学者对于这段特殊时期的亲历、感受、记录、分享，播撒着文学的温暖与鼓舞。

在对于这个“特殊春天”的书写中，上海作家陆续推出抗疫新作。作家们用手中的笔记录感人瞬间，为战胜疫情提供精神支持。

在这其中，作家寒烈以《待春归——记社区抗疫所见》写下了他所在的浦东新区寿光路一个小区在大雨中核酸检测的场景。“身穿白色钹蓝条防护服的志愿者早早守在凛冽的风雨中，大声地维持秩序，声嘶力竭地提醒前来做核酸检测的居民们相互之间保持距离、戴好口罩、提前拿出手机打开核酸检测码……”年轻人帮助老人打印核酸检测二维码，排队的队伍中有抱怨的人，有出声劝解的人，有临时充当志愿者维持秩序的人……这样的场景几乎是上海各小区近期来核酸检测的缩影，为了尽快战胜疫情，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着。作家彭瑞高则写下了疫情里的感动与幽默，他说：“困难比成更具考验意味，一边包扎伤口一边还能与世界幽默地对话，注定不可战胜。”

抗疫的现场，有我们最为熟悉的“大白”守护着人与城市。这些人里除了专业的医护人员，也有在社区担任复杂而细碎工作的志愿者们，他们的工作同样重要。作家薛舒以非虚构的笔法讲述了自己与邻居“楼长辉姐”的相识过程，从刚搬入小区时，彼此总保持着一种距离感与分寸感，即便见面，“也只是点点头，或者，口罩后面传出很轻的一声‘谢谢’”，到因为疫情，因为各项通知的需求，互加了微信，核酸、抗原检测通知，团购菜等消息总是贴心地被告知，她发现自己不再觉得大声言谢是张扬和谄媚，反而是关系的拉近与关心，她称这些志愿者为“一群务实而又低调的人”。

薛舒所描写的邻里之间的相处正体现了上海人的一些特质，作家何建明在一篇《疫中看上海》的文中也谈及了这一点：他在浦东的一家隔离酒店待了十几天，因为两件小事对上海精神与上海品德有了更温暖的理解与体会。身为糖尿病患者，药品和胰岛素是他的必需品，他因准备不足而担心时，一个上海朋友一句“好的呀”为他解决了多个难题。在他看来：“上海人讲话和办事，有一种长期形成的说话语气、做事风度和为人格调，并且成为‘上海人’的一种独特与鲜明的个性呈现。”

除了城区，位于市郊的农村除了自身的抗疫举措外，还承担着农副产品的保供任务。大都市人口密集，疫情之下的管控中，农产品如何保供？奉贤作家汤朔梅从这一问题出发记下了奉贤乡村的抗疫实景：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发起“守护菜篮子行动”，南桥镇的上海岱森农业科技中心大棚内灯火通明，一车车蔬菜从各基地运来，志愿者们分拣、称重、打包、装车，分两批送往对接的封控小区。在他看来，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蔬菜生产基地是保供主体，分散在乡间田头的蔬菜种植户则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，“疫情暴发，蔬菜供应的立体化，更令体会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性”。

文学是我们观照世界的一种方式，它自然地要对当下的现实作出反应。而作家们的艺术责任正是写下、记录、参与并见证，将微小的“我”融入时代里，以文学抒情，以精神动人。

